



黄振新 戴和圣

周恩来诗词中的为民情怀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周恩来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真诚质朴的为民情感和深厚浓烈的为民情怀是周恩来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这也在他的诗词创作中得到了充分彰显。

茫茫大陆起风云

周恩来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抱负和胸襟，目睹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志向，誓要改变中国社会。他带着一腔热血，把心系苍生、救民水火的炽热情怀融入诗歌创作中。

1914年10月，在南开学校学习的周恩来首次公开发表诗歌作品《春日偶成》（二首）。当时，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镇压革命党人，置人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年仅16岁的周恩来感时伤怀，愤而创作，以诗言志。第一首写道：“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极目所见，浓浓的烟霾笼罩着大地，使人感到压抑、窒息。诗中痛斥天下纷乱、战争残酷，表达坚定斗志，誓与反革命势力斗争到底。这是少年周恩来的铮铮誓言。

面对军阀张勋倒行逆施，南开学校教师张肇如擗书流涕，撰成《伤时事》一诗：“太平希望付烟云，误国人才何足云；孤客天涯空涕泪，伤心最怕读新闻。”周恩来读后深有感触，随即奉和一首《次肇如夫子《伤时事》原韵》：“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有别于这首诗的是，周恩来借助风起云涌景象反映当时社会政治之黑暗，但没有沉浸于“空涕泪”的伤痛之中，而是带着蔑视的眼光看待军阀，视张勋之流如秋日之虫，尽管其声唧唧，亦不过是最后的悲鸣罢了，强大的革命自信由是可见。

周恩来关爱人民、感时伤世，诗歌中多次描绘风云际会、山河破碎之景象，又如，“国破山河在，村残草木深”“战火洗劫万室空，吾侨争见九州同”“登高远望，青山渺渺，被遮掩的白云如带”，等等。与此相关，周恩来诗中还喜欢“乌鸦”“鸿雁”等意象，如“群鸦恋晚树，孤雁入寥天”，前者影射反动势力，后者象征革命力量，借此表达推翻旧社会、造福人民的革命理想。

道义争担敢息肩

周恩来不仅有浓郁的忧世之心，而且有坚毅的报国壮志。他在《敬业》创刊词中写道：“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抵御列强，打倒军阀，实现天下太平、万民安康，是周恩来的人生夙愿，也是他诗歌作品中最重要的内容。

1917年9月，周恩来抱着追求真理之壮志赴日留学，临行前作了一首后世广为传颂的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遂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起句化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句，气象博大、视野开阔，彰显了宽广的胸襟和崇高的理想；次句直抒胸臆，读书求学为的

是拯救国家危亡；接着使用张僧繇画龙的典故表明自己愿如巨龙一样腾飞，为祖国和人民创造一番伟业；结尾再用鲁仲连蹈海的典故表达寻求救国道路的决心，纵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决定回国参加革命，钱别时手书该诗赠予同在日本求学的张鸿诒，并于诗后题“返国图他兴”等语，以志救国态度之坚决。该诗就如同作者的座右铭。

周恩来的诗歌具有一种革命家所富有的担当精神和刚毅之气，气势恢宏、情感充沛，感人肺腑又催人奋进。譬如，“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化用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表达担当道义、重整乾坤的决心；“感时勿落泪，誓叫寇惊心”消解了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伤感，抒发热血男儿的刚性和誓与敌寇奋战到底的豪情；“华师尽扫列强日，捷书飞传告整翁”一改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悲情，彰显主动抗敌的果敢以及必将胜利的自信。

周恩来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常以诗抒发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十月革命后，他曾在日记中写下“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将十月革命比作红日，必将给中国带来光明。在《赤光的宣言》中，他引吭高歌：“革命的赤光，从北俄腾起，惊醒了冬虫般蛰伏的被压迫阶级，震动了春蚕般茧缚的世界殖民地，封建余孽，国际的强盗，更被他照的原形毕露。”面对艰难险阻的革命征途，他的信仰没有半点褪色。他在《生别离离》中说道，“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别了又算什么？”歌颂亡友黄爱的救国壮举，认为只要信仰坚定，牺牲便成永生。这也是周恩来人生信念的写照。

百炼千锤斗士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人生最鲜明的特征，他的诗歌既有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也有对人民生活的礼赞，还有对英雄人物

的讴歌。这些诗作内容不一，艺术手法各异，但都洋溢着深厚的为民情感。

1919年，周恩来作了一首新诗《死人的享福》：“西北风呼呼叫，冬天到了。出门雇辆人力车，车夫身上穿件棉袍，我身上也穿件棉袍。我穿着嫌冷，他穿着却嫌累赘；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我感谢他爱我，他谢谢我助他便他。共同生活？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通过描写人力车夫的辛苦劳动，尤其是“共同生活”的设问与作答，深刻揭露当时社会有关“互助”“协作”“共同生活”主张的虚假骗局，控诉剥削阶级的食人本质，流露出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关怀。

无论形势多么艰难，周恩来都有着英勇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在1942年为照片《双乐天图》题了一首诗：“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邓颖超曾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荣高棠的儿子叫“小乐天”，自称“大乐天”，小乐天叫邓颖超“大乐妈”，周恩来则称自己“赛乐天”。邓颖超和小乐天感情深厚、情如母子，人们把他们的合影称为《双乐天图》。解放前最黑暗的时期，在国统区最危险的地方，周恩来带领人民与反动派斗智斗勇，开展革命活动。读罢此诗，周恩来夫妇与人民群众如同亲人的鱼水情深、乐观旷达的革命情怀自然可见。为了便于群众阅读，周恩来特地采用白描的抒写方式，诗歌平白如话、通俗易懂。题诗照片张贴后，群众争相围观，活跃了革命斗争的气氛，缓解了人们的精神压力，激励了广大群众继续战斗。

1943年，周恩来为革命烈士刘志丹写了一首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高度评价为国捐躯的刘志丹，赞其为人民的英雄、英雄中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日理万机，公开的一首诗是1958年作的《欢迎和追念》：“粉身碎骨英雄气，百炼千锤斗士风。走石飞沙留侠迹，上天入地建奇功。”为迎接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和纪念因飞机失事罹难的郑振铎，悲喜交加、彻夜难眠的周恩来提笔而作，把多重交错的情思都化作对英雄的敬重。英雄是伟大的，因为他们为人民奉献、为人民牺牲，周恩来讴歌英雄人物的原因正在于此。

东方歌舞团曾向周恩来赠诗一首，表达从事东方歌舞事业的决心：“东方歌舞一枝花，决心学好亚非拉，党的话儿记心田，誓把青春献给她。”周恩来看后把后两句改为“一心一意听党话，誓把一生献给她”，认为党的话儿记心田还不够，要一心一意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舞台的想法短视了，要通过各种形式为党为民奉献一生。作为一代伟人的周恩来以诗歌寄寓了深厚的为民情怀，这种情怀与他高尚的人格相互映照，焕发出灿烂的光辉，引领人们向上向善，携手创造美好的生活。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



李军辉

今年国庆期间，不少年轻人追随电视剧《觉醒年代》来到红色革命旧址——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参观李大钊故居。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名字早已深入国人心中。李大钊，河北乐亭人，1916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便来到北京，直到1927年4月28日被反动军阀绞杀，在他38年的生命中有约10年是在北京度过的。李大钊在北京的居所先后达8处，可以说北京是李大钊的第二故乡。

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携家人搬到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现文华胡同24号）居住，这是李大钊在故乡之外与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在此期间，李大钊写下《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等文章，以极高的革命热情传播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指导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领导创建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成国共合作，成为20世纪初中国革命的“播火者”。

走进李大钊故居，顿觉庭院幽静古朴而别致，与邻近繁华喧嚣的长安街形成鲜明对比。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李大钊半身铜像，在阳光的映射下显得熠熠生辉，仿佛穿越时空在看今日之中国是否变成如他描绘的青春之国家。

故居院落坐北朝南，分为南北两院，北院为李大钊及家人居住。其中北房是李大钊、赵纫兰夫妇的堂屋和卧室。西厢房是李大钊的书房和会客室。东厢房是长子李葆华卧室和亲友往来居住客房。东、西耳房是长女李星华及次女李炎华、次子李光华等人卧室。

“除道义外，一切事物皆嫌过多”。这是李大钊《简易生活之必要》开篇第一句，“简朴实用”是众人参观屋内陈设之后的第一感受。比如，堂屋的布局，除了中堂画两侧悬挂着由



施崇伟

书是良师益友，喜欢读书的人甚多，我也忝列其中，算一个。虽然读的书不算多，也没有产出多少“像样”的成果，但读书却是真爱，而且在近50年的读书生涯中培养了好些有趣的习惯，丰富了生活。

一是床头读书。读书养瞌睡，是自幼习成的。少时贪玩，瞌睡多，睡不醒。撒野到晚上被父亲拎着耳朵押回家：“快读书去！”于是乖乖捧起书，哇哇读起来，不出三两分钟，书声变成鼾声，口水打湿了书卷。

长大了，读书与瞌睡不分家。上了床，总要捧本书。看上几页，书境和梦境合为一体。读着火烧赤壁，梦中烈焰熊熊；读着黛玉葬花，会在梦中落泪。那种与书中文字的心领神会，妙不可言。久而久之，睡觉有了对书的依赖。有次临时得令出差，什么行李都没带，长途坐车到了目的地，困得人仰马翻。住进酒店，倒头就睡。本以为困倦之后定是一场好觉，可是却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打开灯，找到酒店房间里仅有的一本读物——服务指南，抱着它，倚在床，读了两三行，就睡着了。此后，凡是出差，什么都可忘，切不能落下书。这个床头读书的“陋习”，还差点酿成一场大祸。20多年前，有天停了电，乘暗夜读在床头。我呼呼睡去，烛焰慢慢燃，燃到尽头，点燃桌上书，差点引起一场大火。这样的教训，仍改变不了我的床头读书习惯。有时夜读遇到好书，越读越兴奋，越读越上瘾，不知不觉书

翻到末页时，天已露出鱼肚白。本想用书催眠，却因失控而误了好梦。悔意顿生，但还是“不思悔改”。

二是车上读书。车上读书能治病，治的是我的晕车病。从前在农村，没车可坐。念中学时考上了县里中学，得坐汽车去。闹惯的稻花香，与汽油味相克。一上车，一股怪味袭来，就心发慌，胸口闷，吐得翻江倒海，下车时已成烂泥。县城隔得远，可不能安步当车，于是每一次往返家与校，都像一次上刑场。有一回，带了一本看得上瘾的小说上了车。入座后，一手捂鼻，一手捧书。摇摇晃晃中，我被书中情节深深吸引。待到司机叫我：“读书那个学生，到站了，快下车！”我一愣：叫我吗？我在坐车吗？怎么没有闻到汽油味？从此，我找到一门解晕车“独技”——上车即读书。如今不怎么晕车了，却改不了车上读书的癖好。有书伴着，可忘却旅程的遥远与乏味，我一个人出行时，宁可打车或坐公交，只怕错过车读好时光。我自己的私家车上，工具箱、车门侧、后排座，总少不了书的座席。

近些年，我又添了新习惯——“边吃边读”。年轻时工作忙碌、风风火火，吃个饭哪有正经功夫，常常是狼吞虎咽，板凳还没坐热就扔下饭碗做事情去了。工作了几十年后，年龄大了，条件稳定了，吃饭的环境也安定了。中午吃工作餐时，很多人都是边吃边看手机，我则书不离手，翻开书看，四五十分钟午

置办一处房产。

省下来的钱都去哪了呢？原来，由于早期党组织经费困难，他把每月近三分之二的收入交了党费，剩下的用于接济别人。长子李葆华回忆说：“他很乐于助人，手头只要有钱，谁急需就送给谁，不讲还不还。他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家里的日子够过就行。”这也导致赵纫兰有时陷入无钱买米买菜的窘境，直到校长蔡元培知道了此事，安排学校会计把李大钊每月的薪水直接送给李夫人一部分，以免家中无米可炊。

走出堂屋，右手边便是三间打通兼做书房、会客室的西厢房。只见用于伏案写作的桌椅书柜笔墨纸砚，书桌上平展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北泽新次郎的《劳动者问题》，以及待写的稿纸。还有会议桌书架上摆放的《晨报》《新青年》等国内外报纸杂志。这里曾经是党组织早期活动会议室，李大钊接待过许多国内外知名人士和进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曾在这里和李大钊、张太雷等人见面，讨论解决建党的一些问题。西侧墙上，一幅油画再现了当年李大钊和革命人士在此开会讨论的热烈场景。

如果稍不留意，在马林照片下方的一架黑色木质旧风琴容易被参观者忽视。据李星华回忆，这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李大钊带着他和葆华在东边头发胡同一个拍卖行里淘到的，放在了书房的西墙下。闲暇时，李大钊会教孩子们唱歌，亦可在重要会议召开时借助琴声防敌偷听。

走出书房来到南院，则是今年为纪念建党百年布置的《播火者——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专题展。参观完展览，望着北院堂屋门前的两棵海棠树，忍不住思绪万千，斯人已去犹忆影，海棠花开犹依旧。中国革命的“火种”就是从这样一个僻静古朴的小院落中点燃的！

故居归来，笔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上世纪初，是您点燃了改造古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火炬；今天如您所愿，中国已不再是那个风雨如晦、山河破碎的旧中国了，愿先生透过历史的明月，看见今日中国的盛世繁华。



餐时间也能阅览个几章。闲暇时便去咖啡厅，边喝咖啡边看书是最惬意的时光。在家吃饭看书，难免有爱人唠叨，说吃饭读书不是好习惯，不够养生。我却不想这么想，一日三餐的时间，人们平日里都不太在意，大多是在聊天、扫微信中度过了，但是，算一笔人生的账，积累起来这里面的时间并不少。对于年逾五旬的我，读书才是最好的养生，时间是要精打细算节省起来用的。

我的读书习惯，有的自少养成，已“顽固不化”；有的已成依赖，改变了必不适应。近几年，我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没有读书哪里有人生体味和收获？床前、车上、餐桌，读在日常起居里，“居然”可以让我生活的每一天都丰盈而愉悦。用读书来增加人生的宽度和厚度，这些“敝帚自珍”的读书习惯将一直陪伴我走未来的人生路。

